

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发展

王广州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问题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特征,因而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当代与未来的主要矛盾和变动特征。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揭示了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中4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0~14岁人口首次低于60岁及以上人口,少子老龄化进入新阶段;二是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中国从乡村大国发展为城镇大国;三是家庭户平均规模首次低于3人,一人户比例超过1/4,传统家庭结构特征迅速弱化;四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高的历史。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判断人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有利于从人口发展客观规律出发,抓住机遇,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人口发展的新趋势

人口发展的基本逻辑可以抽象为人口平衡方程,其中,人口增长因素包括出生和迁入,减少因素包括死亡和迁出。出生和死亡不仅影响人口总量和结构,而且与人口的再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出生人口规模是人口系统再生产能力的根本保证。对于封闭人口系统,出生与死亡的数量关系决定人口再生产的走向。由于反映死亡水平的平均预期寿命变动方向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而影响出生规模的生育率变化并不确定,因此,生育水平及其变化方向对人口再生产过程至关重要。

从生育水平及其变动来看,中国人口发展呈现以下几方面的新趋势。

第一,生育率长期低迷。尽管2013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一再放松,截至2022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连续6年下降。考虑到三年疫情带来的育龄人群短期健康损失的影响^①,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规模仍将延续下降趋势。根据2020年以来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21年和202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8和1.0左右。可以推断,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处于极低水平,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由于目前生育水平的变动方向与政策努力方向不一致,生育率长期低迷的风险增大,恢复到合理区间的任务艰巨。

第二,平均初婚年龄和离婚率快速上升。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

^① 王广州(2023):《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晋阳学刊》,第2期。

性为 27.95 岁,分别比 2010 年上升了 3.63 岁和 3.95 岁。相比之下,2000~2010 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了 0.64 岁,女性上升了 0.72 岁。可见,同样是十年,2010~2020 年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幅度远超过以往,这个变化对人口再生产过程影响巨大,特别是显著推动了时期生育率大幅下降。与平均初婚年龄大幅提升类似,2000 年以来 25~44 岁已婚人口的年龄别离婚比例不断上升(见图 1)。以 35 岁已婚女性人口为例,其离婚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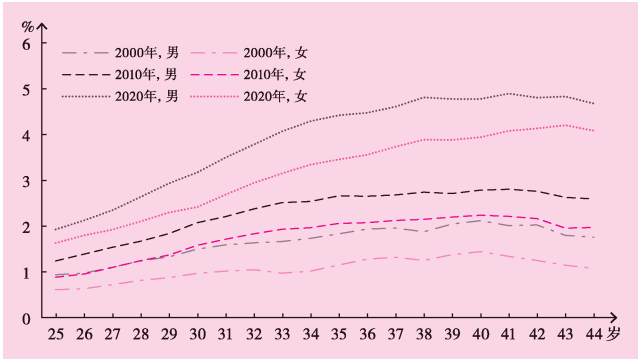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以来历次普查时全国 25~44 岁已婚人口的年龄别离婚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

由 2000 年的 1.15%上升为 2010 年的 2.06%,到 2020 年进一步上升到 3.46%。已婚男性人口的年龄别离婚比例比女性更高,2020 年 35 岁已婚男性的离婚比例为 4.2%。这些数据反映了近年来离婚率不断上升和婚姻稳定性持续下降的现实。由于平均初婚年龄和离婚率大幅上升,不仅婚内生育推迟、时期生育率显著下降,而且终身生育率也大幅下降。

第三,人口加速负增长趋势形成。人口转变的结果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根据稳定人口理论,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既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也是人口再生产的结果。结合实际人口过程来看,1990 年中国人口净再生产率已低于 1,其含义是人口再生产是萎缩的;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净再生产率不到 0.6,意味着生育的女孩替代母亲的比例比 1990 年下降了 30%以上。2020 年的人口净再生产率略有回升,但仍很低,仅为 0.62^①。根据国际经验和人口学理论,人口净再生产率长期远低于 1 意味着促使人口负增长加速和加深的人口条件基本形成,亟须引起高度重视。

总之,从人口学理论和人口发展内在规律来分析,1990 年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发生重大转变。“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既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未来中国人口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二、中国人口发展的新问题

人口内在增长率持续下降意味着,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矛盾转向结构性矛盾,未来人口将进入长期负增长和加速负增长时期。这一发展态势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此带来的新问题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① 王广州(2023):《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晋阳学刊》,第 2 期。

（一）少儿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在校受教育人口总量将大幅减少

2013 年以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带动了出生人口规模的短暂回升，受此影响，2010～2020 年 0～14 岁人口规模从 2.21 亿人增加到 2.53 亿人。随着政策效应释放殆尽，出生人口规模重新转入快速下降。假使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在 1.0～1.2，预计 2035 年 0～14 岁人口规模将下降到 1.26 亿人，仅约 2020 年的一半。低龄段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意味着，若年龄别在校人口比例保持 2020 年的水平不变，那么，未来在校受教育人口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小学在校人口规模持续下降，预计 2035 年下降到 4 700 万人左右，比 2020 年减少 8 000 万人以上，年均减少 500 万人以上（见图 2）；其次，初中和高中在校生规模将经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过程。初中在校人口规模预计在 2026 年达到峰值，峰值时比 2020 年多 500 余万人；此后快速下降，到 2035 年时仅约 3 300 万人，比峰值水平低四成以上。高中在校人口规模预计于 2029 年达到峰值，峰值规模比 2020 年高出约 1 000 万人。2032 年以后，初中在校人口规模开始低于高中在校人口规模，成为教育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再次，在 2035 年以前，大专及以上学历在校人口规模预计保持上升趋势。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断，2020 年全国大专及以上学历在校人口规模不到 3 900 万人，预计到 2035 年相应规模将超过 4 690 万人，超过初中、高中在校人口规模，与小学在校人口规模接近。届时，高等教育在校人口占有所有在校人口的 27.84%，比 2020 年上升 12.89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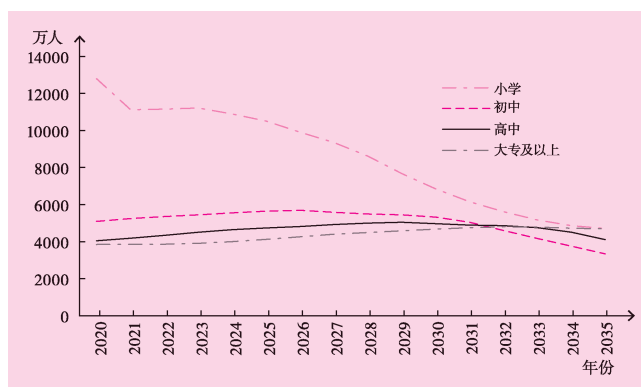


图 2 2020～2035 年在校人口规模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预测。

综上所述，尽管各教育阶段在校人口的变化趋势不同，若年龄别在校受教育模式不变，在校受教育人口总量将快速下降，从 2020 年的 2.58 亿人下降到 2035 年的 1.69 亿人。从结构上来看，小学在校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结构特征不复存在，各级学校在校规模相对接近，高等教育规模逐步超过高中、高中超过初中。简言之，未来学校教育规模和结构受人口变动的影响巨大。

（二）青壮年劳动力总量加速下降，优质人力资源占比降低

低龄人口规模大幅下降产生的影响随时间不断上移，引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结构的新变化。

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来看，尽管短期内 15～64 岁人口稳定在 9.60 亿人以上，但 2027 年起相应人口规模开始大幅下降，预计到 2035 年下降到 9.06 亿人，比 2026 年减少 6 800 万人。2026～2035 年，15～64 岁人口预计平均每年减少 755 万人以上。

从年龄构成来看,青壮年劳动力下降迅速。预计2035年20~44岁人口规模下降到4.12亿人,比2020年减少7000万人以上。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不同,45~64岁人口规模先增后减,2027年达到4.31亿人的峰值,2035年回落到4.16亿人。其中,60~64岁年长劳动力由增长转为减少的时间更晚,2032年达到1.19亿人的峰值,比2020年增加4600万人;预计到2035年下降到1.08亿人,仍比2020年多3500万人。

综上所述,劳动年龄人口在规模减小的同时,年龄结构快速老化。15~64岁人口中,20~44岁人口占比由2020年的50%下降到2035年的45.47%,而45~64岁人口的占比则从2020年的42.47%持续上升到2035年的45.92%。

(三) 人口老龄化加速,高龄化、女性化趋势明显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从老年人口规模来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约1.91亿人,比2010年高0.72亿人;预计到2035年相应规模将超过3.38亿人,相当于2020年的1.77倍。老年人口规模在2027年以前上升相对缓慢,年均增长不到0.5个百分点;2027年起,相应增长速度预计大幅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高达24.64%,比2020年高11.12个百分点。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同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规模和占比快速上升。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3580.08万人,预计到2035年增长到8236.48万人,相当于2020年的2.3倍。同一时期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预计从18.78%上升到24.40%,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性别比总体呈下降趋势,由2020年的93.23下降到2035年的91.00;其中,高龄老人性别比预期将上升,由2020年的74.27上升到2035年的76.58。

总之,以超低或极低生育率为主要动因的人口负增长成为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发展面临的新国情。如何破解极低生育率带来的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不断化解人口结构性矛盾、解决人口重大转变带来的新问题,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攻克的重大课题。

三、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战略

坚持系统观念认识人口问题,需要运用系统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人口现象,全面把握其发展规律。系统分析和科学预判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目的在于准确把握人口转变的新机遇,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变动挑战的人口发展新战略。

(一) 把握人口重大转变的新机遇

虽然人口加速负增长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但由于不同人口队列差异明显,因此,人口转变过程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存在新的机遇。新时期人口重大转变带来的新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人口总量下降有利于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始终面临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

的突出矛盾。单纯从人口总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来看,人口总量快速下降的过程也是人均资源提升的过程,二者突出矛盾不断缓解成为可能。因此,人口总量下降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关系,为区域人口合理优化布局提供新的空间或余地。

第二,学龄人口规模下降有利于提升人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低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于总人口减少速度,这为调整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和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实现生均教育资源提升、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提高。

第三,低龄老龄化阶段有利于完善人口高龄化养老服务体系。尽管中国已经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但与少子高龄化阶段还有显著区别。新中国历史上最显著的出生高峰在1963~1972年之间,该队列进入老年和进入高龄的时间影响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性质和进程。2043年以前,全国老年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低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由于低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自理能力平均较好^①,需要抓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期,构建更加稳固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

(二) 应对人口重大转变的新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提高创新驱动能力与社会经济的整体活力,而人力资本的核心是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这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活力的基础条件,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从人口底层逻辑来看,生育率极低导致人口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整体活力下降。因此,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尽快破解生育率长期低迷的难题,摆脱低生育困境。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稳定的婚姻家庭、和谐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发展能力是社会稳定和活力增强的重要标志。从经济发展的动力考虑,劳动力投入对产出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有关,也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劳动力总量下降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劳动力老化也会对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压力。因此,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积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考虑到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不利条件,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水平、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更加迫切的战略任务。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牛建林)

^① 王广州(2022):《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廖少宏、王广州(2021):《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状况与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